

苏联模式的特征及其与 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关系

□ 孔寒冰¹ 项佐涛²

内容摘要 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从本质上讲就是弱化乃至改变苏联模式，因此，后者的时空适应性和多层次性特征直接影响了改革的起始、进程和效果。苏联模式的时空适应性决定了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或早或迟都要进行改革，但改革时间有前后差别。苏联模式的多层次性决定了改革是一个由浅到深的过程，越往深层次发展，改革的难度会越大，甚至改革有夭折的可能。因此，苏联模式的特征是我们认识和评价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重要视角。

关键词 苏联模式 时空适应性 多层次性 改革

作者 1孔寒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项佐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北京：100871）

近期，中共中央党校张喜德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陈锡喜教授，在如何评价赫鲁晓夫改革及其与中国改革开放关系问题上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讨论。一方认为，赫鲁晓夫改革开放的理论与实践为我国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历史启示，才使得我们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认为，不能将二者做简单排列和牵强类比，赫鲁晓夫改革开放的作用不能夸大，中国的改革实际上走的是一条自发探索、自主创新的道路。（详见《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3期和第7期）从直接内容上看，两位教授争论涉及的只是中苏两个大国改革间的关系问题，但在更深层次上涉及的却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应该如何评价不同国家间改革的借鉴意义等更深层次的问题。本文试图站在更广阔的视角下，结合苏联模式的时空适应性和多层次性两个特征，从整体上对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要改革、如何改革作一探讨。

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要改革 ——苏联模式的时空适应性

要准确分析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是如何发生的，不同国家间改革的借鉴作用有多大，首先要明确被改革的对象。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从本质上讲就是弱化乃至改变苏联模式，这点学术界已经达成共识。

所谓苏联模式指的是苏联在上个世纪30年代确立起来的一种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高度

集中的社会主义体制。苏联模式的产生与俄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和特殊环境有关。第一，俄国政治文化的特点是专制。沙皇是国家的核心和象征，在日常生活中起着重大作用。政治变革、经济变迁、宗教活动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都由沙皇操纵和决定。第二，俄国经济发展与西欧相比非常落后。在十月革命前，俄国资本主义虽然有了一定发展，但远远落后于英美等发达国家，自给自足的村社经济仍占很大比重。在俄国历史上，国家干预经济是常态，从1861年农奴制改革开始，俄国的现代化就是在沙皇政府的推动下进行的。第三，现代化的迫切需要。面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像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若不实行工业化，就会沦为西方大国的附庸。然而，在外国资本控制着丰富的资源和巨大的市场的背景下，尽管俄国的私人资本有一定的发展，但力量十分薄弱，不足以完成工业化。因此，客观上讲，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肩负的是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使命。^[1]第四，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面临的国际形势非常险恶。虽然击败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但是，苏联一直被战争的阴影所笼罩，一切社会生活都以战备为轴心的发展思路得到了广泛的认同。^[2]这四个产生条件决定了苏联模式担负着维护国家独立和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历史使命，以及实现这些任务的方式是高度集中的。

在实践中，苏联模式的确成为落后国家通过高度集中的政治力量整合全社会的资源，快速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方式。苏联、东欧和中国都通过采用苏联模式建成了一套基

本完备的工业体系。为了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生存，重工业被放到优先发展的地位，而利用农业全盘集体化剥削农民则成为工业积累的主要方式之一。这种“以野蛮战胜野蛮”的工业化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苏联综合国力的提高，使苏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为能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

然而，任何国家的现代化能够持续进行，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二是将现代化的成果在社会各个阶级、阶层间合理分配，以产生支持现代化进行的阶级基础。苏联模式却不能满足这两点。

首先，计划经济模式的优点在于它超强的动员能力，能够在短时期内集中人力和物力迅速建成工业项目，但也有严重的缺陷——它的经济管理方式是粗犷型的。企业一经建成，弊端随之暴露。对领导者来说，最重要的业绩不是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而是如何完成上级布置的计划任务。即便工厂有能力超额完成任务，他们也不愿意这样做，因为上级制定下一年计划的根据是当年的产量。这样一来，计划制定者得到的信息严重失真，计划经济因而成了一种特殊的“无序”经济。^[3]正如有的学者指出：以强制增长为核心的计划经济模式并非没有经济增长的极限，通过最初一代人“节衣缩食”换取的高速经济增长，无法长期维持，“经济增长率迟早会逐渐下降，而且越来越明显。每一代人为下一代人留下沉重的包袱（由于总是推迟，紧急和繁重的任务将不断累积）和极不协调的经济结构”^[4]。

其次，从现代化成果分配的角度看，社会内部出现了极大的不平等。掌握行政大权的领导者垄断了所有政治资源，国家的民主政权流于形式，广大民众基本处于无权状态。各级领导成为经济计划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垄断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分配和使用，按官职大小享受特殊住房、特殊服务、特殊供应和特殊工资等。他们虽然不拥有大量的私有财产，但有特权，因为特权不是直接与私有财产挂钩而是与权力直接挂钩。它可以通过手中的权力享受集体和国家的财产。领导者的官阶不同，享受的“权利”也不同，“一切都取决于官级高低”^[5]。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广大民众却生活在日益加剧的“短缺经济”中。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尽管经济增长带来的大部分效益被特权阶层截取，但由于经济还是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计划经济下的福利政策还能够维持，可是普通劳动者的生活仍差强人意。然而，70年代中期后，随着经济停滞，各方面的福利政策遇到很大困难，生产和生活资料的供给匮乏现象更为突出，以致根据国家计划凭票分配的分配方式逐渐难以维持。领导们还垄断着意识形态的解释权，任何不同的观点都会被视作“毒草”或“另类”。通过政治、经济、文化资源三位一体的垄断，官僚成为一

个脱离人民群众的“特权阶层”^[6]或“新阶级”^[7]。

总的来看，苏联模式时间上的适应性的表现就是：在任何一个国家里，苏联模式都是在初始阶段正面效应大，负面效应小；但从长远看，随着落后国家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它会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这就是苏联、东欧和中国等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或早或迟都要进行改革的原因。同时，由于采取苏联模式的国家的初始条件不同，便产生了苏联模式空间上的适应性差别。它的具体表现就是：政治上专制传统越强、经济发展越落后的国家就越适用苏联模式；反之，民主传统越强、经济越发达的国家就越不适用苏联模式。对冷战期间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苏联模式最不适合的是东欧国家，最适合的是中国。正因为如此，苏联、东欧和中国在同一时间内对苏联模式的评价不一样，与此相适应的是进行改革的时间前后有差别。改革苏联模式的呼声首先出现在东欧，其次是苏联，最后才是中国。这种因时间和空间差别而产生的分歧，成为影响中苏关系、苏东关系、中国与东欧关系的主要因素。当多数东欧国家试图摆脱苏联模式时，苏联绝不容许东欧国家超越它的底线。当苏联要在某些方面的表层上调整这种模式时，中国则批它搞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当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与东欧、苏联的关系便都进入了正常化阶段。

具体到赫鲁晓夫的改革，它打破了苏联模式是社会主义唯一样板的神话，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起到了示范效用：刺激了东欧国家20世纪50—60年代改革的发生，但当时却引起了中国的极大反感，随后的“反修防修”就是针对此而言。如果说中国改革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有所借鉴，那也差不多是20年以后的事，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1978年才开始的。

改革发生在哪些方面 ——苏联模式的多层次性

苏联模式的另一个特征是它的多层次性，这是评价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深度如何的重要视角。

苏联模式是由多个方面构成的统一体，这一点相关文献都讲得很清楚了。概括地说，政治方面，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共产党内实行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的原则。党政合一，议行合一。经济方面，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和排斥市场规律的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以高度集中的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决策权、人力物力财力的支配权全部集中在中央。党和政府通过发布命令、做出决议的办法和采取行政组织手段，与各企业和经济组织发生关系，组织社会经济生活，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产品供销、价格等统统由国家规定，企业没有自

主权。意识形态方面，实行思想灌输和控制，将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作为唯一正确的真理，并通过党和国家的宣传机器向人民群众灌输。对外关系方面，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两种国家的对抗性，以及前者战胜后者的必然性。

然而，苏联模式的这些方面不是平铺在一起的，相互之间有着复杂的立体交叉关系。哪些属于它的核心内容，哪些属于它的深层内容，哪些是它的浅层内容，哪些方面易变也可以变，哪些方面难变甚至也不能变，这种“变”实际上就是通常所谓的改革，但相关文献却鲜有从这种角度论及的。苏联模式是一种球状的社会发展结构，易变的或可变的都是从外层开始。比起经济、意识形态和对外关系等方面，政治方面是苏联模式的里圈，最先形成。不过，政治方面也分为政治制度和行政管理两个主要部分，前者基本上是不能触动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共产党一党执政是核心，决定着社会的性质。后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变换，也容易变化，并且不会从根本上损害社会制度本身。经济方面处于政治的外层，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和运行机制两大部分构成。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经济的运行机制往往先变，而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后变。不过，它们的变都是一个从浅到深渐进的过程。对外关系方面又是在经济和政治之外并服务于它们，带有很强的适用性，变与不变或者说改革不改革，以及如何变或改革完全取决于政治与经济的需要。苏联模式的最外层是意识形态和文化方面，它们都服务于内政外交并为它们的可变与不可变、变与不变提供舆论和智力方面的支持，通常舆论上的支持在先，而教育上的支持在后。意识形态和文化教育虽然在最外层，但打造的却是苏联模式的神圣光环。不除去这种光环，苏联模式任何部分的改革都难以进行。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过程中都出现过理论先行、解放思想的现象，原因就在于此。但是，这种思想解放的程度如何则取决于改革对象的难易程度。

不能否认，中国改革开放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苏联和东欧改革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和教训。但是，由于赫鲁晓夫的改革在内容上触及的只是苏联模式各个方面的表层，只是

小修小补。因此，它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借鉴意义不能夸大。

中国改革——由浅到深逐层推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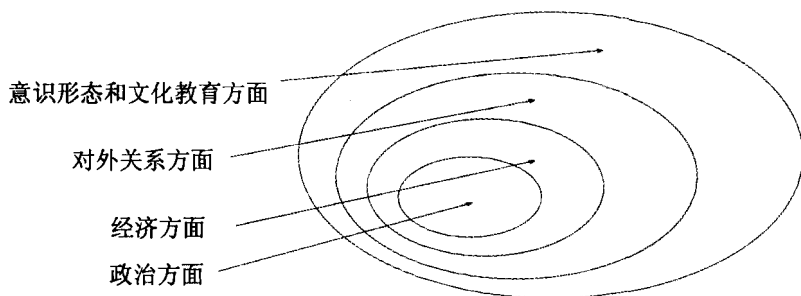
与赫鲁晓夫的改革相比，中国改革走的是逐步推进和逐层深化的道路，是从局部、从表层开始，逐步推向全面和走向深入。其中，每迈出一步都有相应的理论讨论甚至激烈的争论，思想禁锢不断地被突破。

改革之前，在强化苏联模式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使原本畸形的社会生活无法正常维持，政治动荡无序、经济濒临崩溃，民众生活在非常低下的生活水平之中。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亟需解决的是如何给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解决民众基本的生存需求。因此，改革苏联模式的第一步是经济方面的改革。1982年之前，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搞活经济和局部的改革，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发展小私有经济，小规模地引进以香港为主的外资等，“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8]。改革的实质就是修正苏联的经济运行模式，它的参照系就是市场经济的运行环境和在这种环境下生产的非公有制企业。1979年，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建设要利用外资，同时要发挥原有工商者的作用。198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在深圳、珠海、汕头设置经济特区。就其实质而言，经济特区营造了一种市场经济环境，吸引外资，开始引进西方的市场经济和突破苏联模式的经济方面。不过，此时在人们心目中，“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深蒂固。比如，创办经济特区之初就有它到底是改革开放的“窗口”还是旧中国的“租界地”之争。

不管农村的联产承包、经济特区的创办和引进外资起步有多么艰难，中国的改革开放毕竟启动了。然而，小规模 and 浅层次的改革搞活释放的经济能量是有限的，远远不能满足现代化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调整经济运行方式，改变计划与市场关系成为迫切需要。随着改革开放范围的不断扩大和内容的不断深化，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不断地调整对计划与市场的社会角色的看法。1982

年中共十二大正式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改革目标，并开始走上了探索计划与市场关系的道路。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的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不是那种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1987年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讲话给计划与市场关系最终定了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

图1 苏联模式的多层次性



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9] 同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个过程中,计划经济逐渐淡出了中国的经济舞台,而市场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作用逐渐增强,成为了资源配置的主体。

在过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框架被突破的同时,支撑它的单一公有制也受到冲击。与此相对应的是,随着市场经济框架的逐步搭建,支撑它的多元化所有制形式开始形成。改革开放30年来,党的理论对所有制的看法不断地改变,从坚持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扩展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公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扩展到国有独资、国有控股和参股企业,集体所有、集体联营企业等多种形式。非公有制经济从个体经济扩展到私营和外资经济,其地位和作用从“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上升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经济的转型,服务于经济的对外关系和为经济提供技术支持的教育体制也都发生了转型。对外关系方面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改变了对时代主题的看法,战争与革命的观念为和平与发展所取代,中国人开始以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学习的而不是敌对的心态看待外部世界,从而奠定了对外开放的思想基础。第二,改变了对中国与世界的看法。其中,最值得提及的就是长期被中国人引以为豪的“一无内债、二无外债”为大量吸引外资所取代,大量引进外资成为中国经济生活的主调之一。外资给中国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建设所需的资金,更重要的是,外资企业作为一种新的经济运行和管理方式成为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催化剂。首先,它促使长期生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人,对贴着社会主义标签的单一公有制形式、指令性的计划、平均主义的分配形式等计划经济范畴进行反思,对曾被贴上“资本主义”标签的商品、市场等市场范畴进行了重新认识。其次,它推动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作的中国企业,改变了以往完全依靠国家的计划而没有任何自主精神的被动做法,按照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以市场为导向从事自己的经营活动。最后,促使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行使自己权力的宏观管理部门,不得不正视由于外资进入和外商投资企业出现所造成的更为复杂的经济生活,改变过去单凭行政命令来管理经济生活的职能,开始运用利率、税收和汇率等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和法律手段来管理经济生活。

经济改革也推动了思想文化和教育方面的变革。经济成分、利益关系、分配方式的变化导致了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而许多新阶层的出现为不同世界观提供了载体。因此,意识形态领域由原来的单一马克思主义转变成以马克

思主义为主导,中国传统文化、外来文化等其他思潮并存的多元局面。马克思主义也不再是从苏联传入的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更加强调它的中国特色,强调要结合客观现实的变化来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高等教育方面的转型更为明显,也很复杂。不过,在表现形式上,至少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清楚地看出。第一,高校办学模式西方化,苏联式的大学—系—教研室三级管理,改为西方式的大学—学院—系三级管理;第二,多数学科教育内容的西方化,全民学俄语的现象几乎变成了全民学英语,西方的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法学、经济学等课程进入高校课堂,许多大学还成立了相关的学院。第三,留学和进修的重点在西方国家,学成回国的人成为经济、教育等领域的骨干。据统计,截至2008年,80.49%的“两院”院士,77.61%的教育部直属高校校长,71.65%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教学研究基地主任,94%的“长江学者”,72%的国家“863计划”首席科学家均为留学回国人员。^[10] 这种人才培养方式的变化,不仅推动了其他方面去苏联模式化的过程,更提供了市场经济发展的急需人才。

伴随着其他层面的改革,政治领域的改革也逐步推进。最早的也是最大范围的改革发生在行政管理方面。30年来,中国行政管理方面的改革主要是围绕着政府机构的职能转变进行的。为了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国家机关先后集中进行了六次较大规模的机构改革,一些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专业经济管理部门或被裁撤或被改组,一些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新部门得以建立。比如,改组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设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和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等。同时,政府管理经济的手段也由直接管理转变为间接管理,由微观管理转变为宏观调控,由行政手段为主转变到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辅以行政手段。在这个过程中,为了提高行政管理的水平,西方国家的一些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成熟的行政管理经验被借鉴过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通过明确的法律、法规规范国家机关的行为,通过了《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等。第二,建立公务员制度。2006年1月1日实施的《公务员法》,对公务员的条件、义务与权利、职务与级别、录用、考核、职务任免与升降、奖励、惩戒、培训、交流与回避、工资福利保险、辞职辞退、退休、申诉控告、职位聘任、法律责任等都作了明确规定。第三,在各级建立大量的行政学院,讲授西方国家行政管理知识,增加面向西方国家的干部培训和出国交流次数。

与此同时,政治领域的改革还深入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坚持社会主义,如何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等更深的层面。比如,邓小平把“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

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11]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提出党政分开、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消除党内官僚主义、领导干部年轻化等改革措施。江泽民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原则,将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提出党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胡锦涛提出了依法执政、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的有机结合。这些都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执政方式的新探索。

通过改革,尤其是经济体制的改革,中国被文化大革命打断的现代化进程重新启动,生产力得以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善。因此,无论从改革的过程还是从改革效果看,赫鲁晓夫改革远远不能和中国的改革相比。

中国的改革需要继续前行

中国改革虽然程度更深、成绩更大,但并不意味着已经彻底完成。政治领域的改革还有待深入,尤其是党政不分、权力制约等问题亟需解决。几年前,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走势”课题组曾对一些地厅级官员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超过半数的人认为,2010年前顺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在于“党政关系的调整”和“干部任免制度”。^[12]有的学者甚至指出,如果没有制度上的隔离措施,党政不能明确分开,党内权力不能得到合理分解,每一次行政体制改革只可能导致其与市场经济利益更紧密更隐蔽的结合,难以破解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即使再搞多少次行政体制改革,政府职能也难以转换。^[13]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力高度集中的弊端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腐败现象愈演愈烈。涉嫌腐败的官员人数越来越多,级别越来越高,金额越来越大。2003年至2008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在判处的罪犯中,原县处级以上公务人员4525人,同比上升77.52%。仅2006年,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33668件,贪污受贿百万以上的案件623件,有202名厅局级干部“落马”。^[14]更为严重的是,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导致部分人非法暴富,使改革有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15]为官不正、为富不仁事件的频繁曝光引发了民众的不满。据人民论坛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回答“你认为当前社会不公平现象突出地表现在哪些方面”问卷时,96.11%的被调查者认为是“由权力造成的不公平,如以权谋私、贪污腐败”。^[16]这些现象损害了党的形象,影响了党在民众中的公信力,阻碍了改革的进程。

中国改革之所以出现上述难题,其中的缘由无疑是多方面和非常复杂的,但至少需要从两个方面分析。一方

面,改革就是利益关系的一种重新调整。每一种发展模式都会带来一批受益者,一旦发展模式发生转变,就会触及这部分人的利益,对原有利益平衡结构造成冲击。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部分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使改革成果的分配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倾斜,因此,他们积极支持经济体制改革。然而,政治体制的改革则与这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发生矛盾,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建立有限政府,要求改革那种全能型的全权政府,从而影响他们往日的权威,触及他们的既得利益。对这部分人来说,政治体制改革具有被迫性,只有在社会的强大压力下或者不改革会给他们自己带来更大利益损失的情况下,他们才会进行有限的政治体制改革。另一方面,“一个现代化中政治体系的安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一个强大的政党能够使群众的支持制度化。政党的力量反映了大众支持的范围和制度化水平。凡达到目前和预料到的高水平政治安定的发展中国家,莫不是拥有一个强大的政党。”^[17]30年来,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仍属于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总体上仍落后于发达国家,这种状况在短时期内还难以有较大的改变。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还需要迅速建成许多关系国计民生的投资巨大的重大项目,处理一些重大、复杂和棘手的问题。这种情况使得强大的政党和政府在现代化进程尚未结束时成为一种客观需要。现代化建设也需要安定的政治环境,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在协调各方利益的过程中稳步进行,尽可能避免社会的剧烈震荡。为了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需要,中国还需要探索新的政治体制。在社会转型和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保持社会稳定十分必要。如果出现“权力真空”和社会失控,转型中取得的成果也会化为乌有。因此,对中国而言,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维护了国家的政局稳定,增强了抵御风险的能力,可以集中力量解决改革过程中的重大问题。但是,政治体制改革不相应地跟进,就会造成现代化成果分配不公,如贫富差距扩大,民主发展缓慢,官员腐败、特权等现象。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就是在民主和集权之间寻找一种合理的平衡关系,探索一条有限的集权与有序的民主相结合的道路。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

参考文献:

- [1] 张光明. 布尔什维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分野.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9: 191-192.
- [2] 沈宗武. 斯大林模式产生的深层社会原因. 重庆社会科学, 2000(4).
- [3] 奥塔·锡克. 经济体制——比较、理论、批评.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3: 85-94.
- [4] 雅诺什·科尔奈. 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

我国学术界对德国历史的若干认识误区

□ 郑寅达

内容摘要 中世纪时,德国并不是一个落后国家,相反,神圣罗马帝国被认为是古罗马霸主地位的继承者,皇帝是“世界之主”。但辉煌背后潜伏着负面因素。德意志特色不能等同于普鲁士特色。一方面,需要正确认识普鲁士特色;另一方面,德意志特色是由各部族和邦国长期来共同构成的。同时,有必要纠正史学界对《凡尔登条约》、《金玺诏书》和马丁·路德翻译《圣经》等问题的错误看法。

关键词 神圣罗马帝国 德意志特色 凡尔登条约 金玺诏书 马丁·路德

作者 郑寅达,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241)

德国在当今世界,尤其在联合起来的欧洲中,正在起着独特的作用。从历史上看,自中世纪以来,德国在欧洲的发展进程中也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受诸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学术界对德国历史存在着若干认识误区。这些认识误区不仅干扰了国人对德意志前人的理解,还会影响对当今国际形势的把握。前阶段,笔者借独立写作德国通史的机会,对德国历史作了一次较为全面的梳理,产生了一些想法,借此文与学者们共同探讨。

关于神圣罗马帝国

德国在工业化和民族国家形成方面,落后于英法两国。我们正确地把它归入后起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并认为正是这一“后起”性,推动它在瓜分世界的热潮中具有一定的疯狂性,在完成统一后不到20年,即放弃了俾斯麦的“大陆政策”,改而推行“世界政策”,追求“阳光下的地盘”,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19世纪末期以

前,德国一直落后于英法等国吗?它的“世界政策”仅仅导源于后起国家的疯狂性,或者是帝国主义国家追求原料产地销售市场乃至殖民地的具体表现吗?这牵涉到对神圣罗马帝国的认识。

我国学术界经常把神圣罗马帝国同伏尔泰的评价联系在一起:既不神圣,也非罗马,更非帝国。中世纪的德意志人同这样的怪胎联系在一起,似乎必定会处于落后状态。其实,伏尔泰作为18世纪的启蒙人士,他所处的环境是欧洲民族国家正在崛起,评价的对象是处于末期的神圣罗马帝国,使用的标准是反对天主教会的启蒙思想。

实际上,神圣罗马帝国在形成初期,由于基督教和上帝而“神圣”,由于承袭古罗马的光辉而“罗马”,由于地位高于一般王国、具有国际性权威而成为“帝国”。其最早的源头,可以追溯至公元800年查理一世被罗马主教利奥三世戴上凯撒的金色冠冕,并获得刻有“罗马帝国再生”字样的帝玺,其正式称号为:“上帝所祝圣的最和蔼的奥古斯都,罗马人民伟大而爱好和平的皇帝,上帝恩赐

学.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192.

[5] 鲍里斯·叶利钦.我的自述.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59.

[6] 列夫·托洛茨基.被背叛了的革命.北京:三联书店,1963.

[7] Milovan Djilas. The New Class: 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1957.

[8]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6.

[9] [11]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177.

[10] 张力.改革开放30年我国教育成就和未来展望.中国发展观察,2008(10).

[12] 青连斌.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太滞后.中国改革,

2003(10).

[13] 辛宇.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样板间”.今参考,2008(9).

[14] 中国法院网. <http://www.chinacourt.org>.2008.2.10; 最高人民检察院网. <http://www.spp.gov.cn>.2008.1.10.

[15] 吴敬琏.市场经济应防止陷入“权贵资本主义”.决策与信息,2004(1).

[16] 艾芸.96%民众不满权力不公.政府法制,2008(24).

[17] 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联书店,1989:396.

编辑 杜运泉